

图文精编本

部级领导干部 历史文化讲座

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

(上)

国家图书馆 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精
编
本

部级领导干部 历史文化讲座 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

国家图书馆 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全二册）/
国家图书馆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013-5515-0

I .①部… II .①国… III .①社会科学—干部教育—教材 IV .①C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3245号

书 名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政智慧（全二册）

编 者 国家图书馆 编

责任编辑 耿素丽 王燕来 许海燕

特邀编辑 白 勇

装帧设计 张合涛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es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52.25

印 数 1—15000套

书 号 ISBN978-7-5013-5515-0

定 价 128.00元

目录

上册

宁可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律	(1)
林甘泉	秦汉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及问责制度	(21)
王子今	汉武帝与汉武帝时代	(39)
吴宗国	说不尽的盛唐	(59)
孟宪实	贞观之治的历史启示	(75)
邓小南	宋代历史再认识	(89)
邓小南	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	(111)
邓小南	“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	(127)
梁衡	《岳阳楼记》的政治财富与艺术思考	
	——范仲淹评说	(157)
张国刚	《资治通鉴》与王朝兴衰	(175)
张大可	司马迁笔下的明君贤臣与开明政治思想	(199)
陈高华	元朝的兴衰及其历史启示	(213)
王天有	明代国家权力的运作	(227)
熊召政	张居正与万历新政	(243)
商传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	(255)

戴逸	论康雍乾盛世.....	(281)
张海鹏	洋务活动及其现代的解释.....	(305)
唐浩明	从清流名士到国家重臣 ——张之洞评说	(333)
翁飞	中国近代史上的李鸿章	(351)
章开沅	百年锐于千载：辛亥革命反思	(369)
杨天石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377)

下 册

李学勤	追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399)
汤一介	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之贡献	(421)
任继愈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经验	(447)
张岂之	传统文化与优秀民族精神.....	(467)
刘梦溪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489)
刘海年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若干问题	(523)
阎崇年	读史·治国·修身	(551)
范曾	走进国学	(571)
李中华	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	(587)
钱逊	《论语》精要及其文化内涵	(605)
李学勤	清华简与先秦思想文化	(631)
刘家和	先秦儒家的“中庸”思想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641)
郭齐勇	《中庸》及其现代意义	(653)
颜炳罡	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	(669)
杜维明	文明对话和儒学创新	(693)
杜维明	儒家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仁”的解析	(719)
陈鼓应	庄子的思想及其生活智慧	(735)

楼宇烈	魏晋玄学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749)
李存山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流变	(763)
刘 庆	《孙子兵法》 ——超越时空的军事理论经典	(791)
王邦维	“西化”还是“中国化”：从佛教的历史看中外文化 的交流与互动	(809)



宁可

中国王朝兴亡周期律

宁可，湖南浏阳人，1928年12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中共党员。历史学、敦煌学专家。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唐史学会常务理事、《历史研究》副总编等职。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宁可史学论集》、《史学理论研讨讲义》、《敦煌社邑文书辑校》（合作）、《敦煌的历史与文化》（合作）等；主编或参加主编有《中国经济发展史》《隋唐五代经济史》《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敦煌学大辞典》《英藏敦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等。

《三国演义》一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2100多年间，许多王朝此亡彼兴，此兴彼亡，就像走马灯一样转换。总的印象是，王朝的兴亡似乎有一个循环的周期，这种历史的循环论早在西汉就出现了。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三王（夏商周）之道若循环。”其根据就是战国以来阴阳家传下来的所谓“五德终始说”，宇宙间有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把它附会到王朝命运的兴替。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话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这大概是第一次提出王朝兴亡周期律。兴兴亡亡的王朝里面情况也不大一样，有的王朝时间长一些，有的王朝时间短一些；有的王朝版图大一些，有的王朝版图小一些；有的王朝国力强一些，有的王朝国力弱一些；有的王朝内部相对稳定，有的王朝却是变乱频仍。历史上那些时期长一些、版图大一些、国力强一些的王朝，数得出来的有十几



司马迁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二人曾谈起历史周期律问题

个，有的王朝虽然时间短，但地位重要。

我这里列了一个表，以说明王朝的更替。

王朝	起讫	享年
秦	前221—前206年从秦始皇统一六国 到被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二世而亡	15年
西汉	前206年—公元8年由王莽禅代	215年
新莽	9—23年亡于新莽末年农民大起义	15年
东汉	25—220年为黄巾农民大起义瓦解，由曹魏禅代	196年
三国	220—280年蜀亡于魏 (263) 魏由西晋禅代 (265) 吴亡于西晋 (280)	61年
西晋	265—316年亡于匈奴族所建的汉	51年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	317—589年北周禅代于隋 (581)，陈亡于隋	273年
隋	589—618年亡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中江都兵变，二世而亡	38年
唐	618—907年为黄巢农民大起义瓦解，由朱温后梁取代	290年
五代	907—960年赵匡胤借兵变禅代后周	54年
北宋	960—1127年亡于女真族所建的金	168年
南宋	1127—1279年亡于蒙古族人建立的元	153年
元	1279—1368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 (1260年)，为元末农民大起义推翻	90年
明	1368—1644年为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	277年
清	1644—1922年满族建立的清入关统一全国，为辛亥革命推翻	268年

其中秦朝很短，十几年就结束了，西汉长一点，200年出头，东汉将近200年，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段时期又乱了，政权更迭频繁。隋朝很短，38年，唐朝将近300年，五代较短，近60年，然后北宋南宋各近200年，元朝100年出头。明朝清朝又比较长，将近300年。这些王朝中大一点、长一点的大概有十来个。

这些王朝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兴盛，建国以后发展开拓，过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停滞，发展不起来了。再过一段以后开始衰落灭亡，

被新王朝取代。时间比较长点的王朝面临的问题往往有相似之处，借用黄炎培的话，可以称为王朝兴亡周期律。那些时间短促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其兴也骤，其亡也速，在很短的时间内其矛盾迅速激化、爆发，似乎是更明显地说明了王朝兴亡周期律的作用。

二

一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不外三种途径：

第一个途径是靠战争，所谓“以马上得天下”，靠骑马打仗建立王朝，得到天下。这里又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直接推翻了旧王朝，以后出现军阀混战、群雄并起的局面，新王朝在混战间崛起，其中有一些原来大起义的领袖，在混战中成为新王朝的开国皇帝，比方像秦朝末年的刘邦、元朝末年的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大起义失败后，贵族军阀在群雄混战中建立起新朝，像新莽末年的刘秀、五代后梁的朱温。

还有一种情况，农民大起义没有能够推翻旧王朝，但给了它致命的一击，使它瓦解，新王朝在起义后的混战中降生。像东汉末年的曹操，在黄巾农民起义中起兵，建立了强大的势力，终于他的儿子曹丕当上了皇帝。像隋朝末年农民起义中各种武装势力出现一场大混战，有农民起义军，有旧的贵族、军队将领。其中李渊原来是隋朝贵族，后来也趁机从太原起兵，一直打到长安，当了皇帝，建立唐朝。反过来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把各种武装势力都消灭了，统一了国家。唐朝末年也发生了农民大



汉高祖刘邦是靠农民起义直接推翻了旧王朝

起义，重要领袖是黄巢。黄巢一直打进长安，唐朝的皇帝跑到四川，黄巢起义在长安坚持三年，最后坚持不住撤到山东，在各路军阀的围攻下，失败而亡。经过20多年军阀混战，全国政权落在起义军叛徒朱温建立的后梁手里。

在这两种情况中，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在旧王朝的覆亡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农民起义的结局如何，政权最后还是落到了新的封建王朝手里，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

第二个途径是王朝的更替采取了非暴力的手段，新兴统治集团操控了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威逼旧王朝统治者交出政权，他们成了新的开国皇帝。

但是他们要讲一个好名声，不愿意马上把旧的皇帝杀掉或者把旧的政权彻底摧毁，美其名曰效法尧舜的“禅让”，其实就是篡位。像王莽代西汉、曹丕代东汉、司马炎代曹魏、杨坚代北周、赵匡胤借“陈桥兵变”取代后周，都是借用了“禅让”的名义。

东汉末黄巾起义没有能够推翻东汉政权，但是瓦解了东汉政权。军阀混战中曹操控制了局面，统一了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自己不当皇帝，让儿子曹丕来当皇帝，曹丕上台以后逼汉朝的汉献帝“禅让”，汉献帝提出自己下台，要曹丕来代替他当皇帝，曹丕假装推让，推让几次后，最后就当了皇帝。大家都知道这是篡位，但是要采取表面的欲盖弥彰的手法。曹丕代汉建魏后没有几代，司马懿的子孙控制了大局，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想要控制政权当皇帝，有一个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也是用“禅让”的办法推翻了曹魏政权。南北朝时期，北魏分裂成北周和北齐，北周的一个大臣贵族杨坚要



陈桥兵变遗址

当皇帝，他采取同样办法，把北周的小皇帝逼得退位，然后当了皇上。

“禅让”里更具有戏剧性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本来是军队将领，他要篡后周的皇位。后来周世宗打仗病死了，7岁的小皇帝即位，赵匡胤控制了兵权，发动了阴谋，先制造舆论说后周的皇帝干不长要换人，然后忽然得到一个谎报的军情说北方的辽国进攻，他马上带兵出征，走到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停下来喝酒，半夜里发生兵变，部下闹起来把赵匡胤从睡梦中叫醒，糊里糊涂穿上皇帝的黄袍，即位当皇帝。然后就急忙回到汴京开封，政权一夜之间转换了，改朝换代。“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中国历史上和平篡位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两种途径之外还有第三种途径，那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旧王朝战乱的机会起兵南下，征服半个乃至全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跟南方汉族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北方游牧民族往往在南方汉族政权发生危机的时候出兵，用武力很快征服中国或部分中国。像西晋末年的

“五胡十六国”征服了黄河流域，只有南方没有征服；五代后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占领了现在河北、山西北部的十六个州，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内。北京当时叫幽州，辽国占领后，把幽州称作南京，又叫燕京。辽国跟北宋对峙100多年，后来东北方向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女真族建立金朝，跟北宋联合把辽国打败灭掉，然后双方分赃不均又闹翻，女真族的金朝大兵南下，一直打到开封、南京、苏州、杭州，北宋政权跑到南方建立南宋。后来两国间又打过几仗，最后双方以淮河为界，黄河流域落到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朝手中。

13世纪初北方蒙古族兴起，首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到处打仗，先统一了蒙古大草原，接着往西打，到中亚细亚，灭了西夏，一直打到欧洲，占领了现在东欧一些地方，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都被他们占了，一直前进到巴尔干，打到现在的威尼斯附近，回过头来又把金灭了，接着把南宋也灭掉了。蒙古帝国改名元朝，国土一直到南



成吉思汗

海边，往南到缅甸、越南、爪哇，这样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统一了全国。以前少数民族王朝控制的只是半个中国、黄河流域，现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被控制了。

元朝以后是明朝，明朝末年北方兴起一个新的少数民族满族，就是原来的女真族。满族趁着明末农民起义的机会，进兵入关，控制了一半中国，后来控制全部中国，满族成了整个中国的统治者，这是历史上第二次少数民族统一占领全国。

以上新王朝建立的第一个途径的两种情况都跟农民起义有关系，或者是农民起义直接推翻旧王朝，或者是农民起义没有直接推翻旧王朝，可是给了它一个致命的打击，瓦解了旧王朝，使新王朝得以有条件取代。比如西汉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东汉是王莽末年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唐朝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明朝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清朝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建立的，这些王朝时间都比较长一些，或者将近300年，或者200年出头和将近200年。可见农民起义对旧王朝的打击可能很厉害，打得狠一些，新王朝维持的长一些，可能有这种关系。

为什么王朝兴亡跟农民大起义有关系？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古代中国是农业国，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老百姓主要是农民。农民有一个特点，既是个体小所有者又是个体小生产者，他们是分散的也是很脆弱的，维持生活主要是守着自己的或租种地主的一小块土地，在土地上辛苦劳动，维持很低下的生活，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破产，家里死人病人，或有天灾或有兵祸打仗，甚至封建政府的剥削重了，他们就受不了。往往历史上一个旧王朝，官府剥削非常残暴，农民还能够忍受，可以降低生活水平，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在重负里一旦增加点东西，或者天灾、战争，就像负重的骆驼已达到极限，再加上一根草，就把它压倒了。农民受不了了，活不下去了，起义就开始爆发，一路打过去，很多贫苦的生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参加起义军。历史上的暴动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阶级包括红军起义暴动在内，都是一走就带走一大批人。

这跟封建王朝末期的政治很有关系。王朝末期为政总是很苛暴，赋税刑罚很重。比如秦朝末年“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泰半之赋”就是农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被掠夺。征发兵役和徭役时，村里分闾左和闾右，闾左地位低一些，闾右地位高一点，首先征发闾右后征发闾左，征到闾左，劳动力都给调光了。秦朝末年刑法也很苛暴，所谓“赭衣塞路，图

圈成市”。 “赭衣”是土黄色衣服，罪犯穿的，“囹圄”是牢、监狱，关犯人的地方。满街都是穿囚衣的罪犯，监狱也像市集一样，人满为患。秦始皇残暴地剥削，还要征发比如修长城、戍五岭、修驰道，还有建阿房宫、骊山墓即秦始皇陵。其中阿房宫和秦始皇墓，征发的劳动力各有70万。

此外河套防匈奴，到广东广西一带的移民也有几十万人。秦朝当时的全国人口大约是3000多万，男的占一半，1700多万，老少去掉，也就剩下千把万人，来回征发调度，全国劳动力有很大损耗，结果农民受不了，引发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当时他们带着900人到渔阳（现在北京一带）去防守，结果走到安徽大泽乡，下雨了走不了，他们当时很紧张，就商量，去了过期也是死，不去也是死，不如干脆造反，于是揭竿而起，一群老百姓跟着起来，立刻成为声势浩大的全国农民大起义。隋朝隋文帝篡位建国，一开始搞的还不错。隋炀帝靠着阴谋上台后，修宫室，修东都洛阳城，开运河，修长城，修路，大举巡游，还要打仗，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全国每年征发徭役几百万人，老百姓受不了，爆发小股起义，很快变成大起义，隋朝垮台，隋炀帝最后被隋朝军队兵变杀了，隋朝也就亡了。明朝末年苛征三饷——剿饷、辽饷、练饷，辽饷是对付清朝，打仗要征调军费，剿饷对付农民起义，练饷是练地方武装。民不聊生，死亡枕藉，流民四散。最后李自成势如破竹，攻下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吊死在煤山即现在景山，明朝灭亡。

在历史研究中关于农民起义的评价很不一样，以前人们认为农民起义都是好的、都是英雄，包括李自成、包括太平天国都是英雄，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回过头再看、再反思，就有不同的看法。农民战争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战争本身很残酷，杀人也很多，对经济破坏也很严重，以至于现在有些论者比较过度地渲染夸大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认为战争不仅破坏经济，损害人民、损害生命，而且还促使经济倒退。有一些论点认为太平天国时候对江南破坏太厉害，以致中国近代化受到很大影响，搞不



秦始皇陵



李自成殉难处

成近代化，发展不起来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资本主义，因而太平天国对经济只有破坏作用。

这个论点不能算是公正的。第一，农民如果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不会造反，农民希望有一个稳定平安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就可以了，只有实在受不了才会被迫起来造反。农民

起义规模很大，是一个群众性运动，不是少数人挑起来的，实际上是王朝末期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如果追究战争责任，与其说全归罪于农民，不如说剥削者、统治者要负主要责任。

第二，农民战争是很残酷，但是打仗是双方面的，镇压起义的统治者并不比起义者更“仁慈”，其残酷更有过之。明末战乱中有所谓“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之说。唐朝末年诗人韦庄写了一首诗《秦妇吟》，里面讲到黄巢起义打下长安以及后来战乱的情况，讲到一个流浪的老头儿，说他当年家境很不错，可是现在是“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原来家里丰足得很，有很多财物、粮食，黄巢起义军打过去也抢了，还留下一些，后来附近驻扎的唐朝官兵每天到村子里翻箱倒柜什么都抢，官兵“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结果“家财既尽骨肉离”，原来很富足的小地主财产全没有了，妻离子散，“今日残年一身苦”。所以“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是一个通常的写照。

第三，旧王朝已经腐朽到无可救药，而且并无愿望与能力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农民大起义的冲击，才有可能改变旧的黑暗的统治，给新兴的势力扫清道路，创造条件。这里正体现了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当然，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势力，并不能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只能在战争中和战争后被野心家利用了去作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尽管旧的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但继之而起的还是封

建王朝，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

至于其他两个途径，“禅让”纯属掩耳盗铃，新朝也不可能大力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少有兴革，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并未注入多少新的血液和活力。

北方民族取代旧王朝完全凭借武力，其压制破坏相当重而且难以持久。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如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凭借武力打来打去，最后维持不了多久纷纷垮台。元朝维持时间稍长一点，100年多一点。唯一例外是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维持将近300年，在中国王朝史上比较久，这个王朝有些特殊。清朝统治比较有章法，在民族关系上处理得一般还可以，很多措施比较积极。所以新旧王朝的交替，三种途径情况不都一样，很值得考虑。

三

经过大战乱以后建立的新王朝面对很多新问题，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地主统治者跟农民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跟北方民族的矛盾。这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局面就会改观，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如果不好好处理就会引起社会大动荡，引起王朝很快灭亡。章士钊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一文、台湾学人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

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里说：

自生民以来，中国一治一乱循环无已，不论何代，开国以后，迟或百年，少则数载，政治必趋腐朽，积渐以至于亡，其所以然，乃在不解防微杜渐之术，此固不唯中国然也。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中“瓶颈危机”一节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

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也是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的可以得到胜利。